

吴稚晖在李济深被囚汤山案中的角色^{*}

沈成飞

内容提要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在中央尊荣言重;李济深为地方实力派,在北伐前后的政局中举足轻重。二人为姻亲,关系特殊。李曾引吴为其中央之奥援,吴多少亦以此自重。此一背景是吴稚晖能说服李济深于蒋桂矛盾激化之际犯险入京的重要原因。在汤山事件前,吴稚晖引李入京被拘,于友道有亏;汤山事件后,吴稚晖虽陪李同居,但有半陪半监且图名之象。当然,吴稚晖为李济深恢复自由亦曾极力调和。其间的暗流涌动、纷繁复杂,揭示了近代中国政局之波谲云诡,突显了中国传统政治现代转型的困境与多歧。

关键词 吴稚晖 李济深 蒋介石 汤山案 蒋桂战争

1929年初“湘变”^①发生后,蒋桂两方矛盾迅速激化,战争之舆论顿生。其时,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吴稚晖等人反复邀请、劝说之下入京调解蒋桂纷争。不料此后形势急转直下,战争已如箭在弦。为切断李济深与桂系之联络,蒋介石强拘李济深于汤山,是为汤山案。此案发生后,作为李济深入京的安全担保人——吴稚晖角色尴尬,他随即迁往汤山,陪李同居。然而吴氏在该案中的角色究应如何定位,尤其是其在李氏被拘前后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后果,学术界之辨析仍嫌不清。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吴稚晖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等一手资料,辅以李济深个人资料和当时之报章杂志材料来审视吴稚晖在此案发生前后的关键角色,探讨吴氏在李蒋纷争中的挣扎,以及近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和价值观念。

一、吴稚晖两促李济深入京

1928年中期,随着编遣裁兵运动之进行,国民党内部矛盾重新显现。不仅蒋、冯、阎、李(宗仁)四大军事集团各有怀抱、勾心斗角,且蒋介石和李济深之关系也由亲而疏。蒋对李坐大广东、联络桂系深感不安;李对蒋把持中央、集权独裁颇有微词,两人此时已积不相能。11月,李济深离京回粤。李此

^{*} 本文是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抗战时期广东保甲制度研究”(11YJC770046)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2013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的资助。

^① 1929年2月19日,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改组湖南省政府,驱逐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由此引来蒋桂反目,此即“湘变”。

行时间颇微妙,被认为是对即将召开的编遣会议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极抵制。

李济深此时兼任国军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总务部主任,编遣裁兵工作自然离不开他。为此,蒋介石在李回粤后不久即致电要其返京:“未知吾兄何时来京,希告知,俾定召集国防及缩编会议日期。”^①李济深对此未作明确答复。12月17日,蒋致电陈铭枢、陈济棠、冯祝万等广东军政要员,请其促李入京:“编遣会议拟延至有〔有〕日开始,无非为任潮兄未来之故。……望诸兄力促之。”^②26日,蒋介石再电李济深,请其务必于1929年1月4日前,即编遣会议正式开议前到京。在无法确定李氏行期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吴稚晖出面邀李:“编遣委员会开会在即,百川已来京,闻任潮有不来意。请先生电劝其速来,以全大局。”^③蒋之所以请吴出面,自然是考虑到两者亲密的个人关系。^④接电后,吴稚晖随即按照蒋的措辞和因由致电李济深,邀请其赴京共商国是。该电称:

百川先生已到,编遣会将开,此会开而圆满,党国纠纷与困难,一切可解决;圆满之可能性,得先生亲参,必当实现。当此万无丝毫疑虑。吉凶悔咎乎,动一(原文如此——引者)或妄动,必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局再现。因为促成共食(原文如此——引者),其为首必自戮也矣。千古被动者失败亦有殊荣也。何人不知此义,何况在今日圣杰之数伟人。介公盼先生早到,希企即临。虽奸人不断造谣,然稍具常识者,即知今日之局,千载难逢。相忍求全,光明日进;倘有无知妄作,必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局再现。因而促成烧杀,促成分管,其戎首自请入瓮。弟亦极望先生无疑无贰,即日速临,致沥情奉,党国幸甚。^⑤

鉴于吴稚晖之力邀及各方要员相继入京的事实,李济深最终于1929年1月7日入京参会。然而在编遣会议上,李对蒋之纵横捭阖、损人利己的裁兵政策愈发不满;蒋对李之“事事反抗”、拒绝实质裁兵行为亦耿耿于怀,甚至“面斥其为反革命”。^⑥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李济深启程回粤。当日,蒋当即再电吴稚晖:“此间自任潮行后,冯阎二兄皆有归意。请先生驾京,面商一切。”^⑦

在此当口,“湘变”发生,蒋桂矛盾因之激化。蒋介石此时急欲拆散李济深和桂系之联系。于是,蒋以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为由,2月25日电促其回京就职;政治会议也要求李济深返京会同何应钦等人彻查湖南事件。^⑧同日蒋介石致电吴稚晖,请其再邀李入京:“湘事起后,谣诼繁兴,请先生去电任潮,促其即日返京,以释浮言,而安大局。”^⑨接电后,吴稚晖即致电张静江,要求联合行动:“介公之意,挽此和局应有多方面之斡旋,请先生面慰任潮、季宽两先生即来京,将有所切商也。”^⑩得到响应后,吴领衔国民党元老致电李济深,请其刻日命驾。该电谓: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495—496页。

②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第543页。

③ 《蒋介石致吴稚晖电》(1928年1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吴稚晖档案”,ZHI REEL54/2604.2。以下所引“吴稚晖档案”皆出此,不再一一注明。

④ 吴李为姻亲人所共知,但此前李即以女拜吴为师,李为此每月支付束脩五百大洋。所以,张发奎认定“吴稚晖支持李济深”。参见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记录,郑义译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⑤ 《吴稚晖致李济深电》(无日期),ZHI REEL128/11966。

⑥ 《蒋介石日记》(1929年1月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以下所引《蒋介石日记》皆出此,不再一一注明。

⑦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83页。

⑧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151页。

⑨ 《蒋介石致吴稚晖电》(1929年2月25日),ZHI REEL54/2704.2。

⑩ 《吴稚晖致张静江函》(1929年2月),ZHI REEL128/11188。

广州李任潮先生勋鉴：敬悉大旌不日莅京，同人忭慰。此次编会开后，值除夕清晏，故先生与阎、冯诸公皆乘暇反（返）里，即介公亦曾回甬扫墓。但好事之徒，因而散布谣言。近者适有湘事冲突，事本寻常，然谣诬难免不因之加甚，是以介公急归京。幸而德邻先生亦始终坐镇京沪，人心因之一定。三大会期已近，先生为中央重要执委，固当早来商榷。即时局因先生莅临，必能使望治者尤深欣慰。当此统一初成，必愿诸有力之重要元勋，日夜集思，稳定于中枢，则上理因热度而至臻观（原文如此——引者），拱党国于磐石之安。而后诸公方解释其宵旰之勤。否则中枢不稳定，局部断无苟安之可能。此意贡献已频，素蒙先生等采纳。故当此危疑之际，伏望剑及履及，刻日命驾，不胜盼幸。诸同人并此。^①

吴电文用词和语气皆出自蒋氏电文，和蒋说法如出一辙，自是衔命而来。1929年3月11日，李济深在吴稚晖等一再要求下自粤到沪，但李在是否入京问题上仍态度游移。于是，吴稚晖联合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奉蒋介石“以人格担保”之名赴沪敦请李济深入京。在上海，吴几乎以命相搏，最终请得李和国民党“四老”一同回京。当时报纸记载：“吴稚晖、蔡元培多方劝驾，并以生命为担保，舌敝唇焦，始敢大胆前往”^②，即此之谓也。综上可知，在“湘变”发生后，蒋桂战争“谣诬繁兴”之际，吴稚晖奉蒋命频频出动，四处联合，八方奔走，最终请得李济深入京。说其衔蒋命而来、尽力替蒋办事应是事实。

二、吴稚晖于友道有亏

1929年3月，国民党内部怒潮暗涌，而党外关于蒋桂战争之谣诬亦绘影绘声。桂系李宗仁、胡宗铎等咄咄逼人，摆出决不退让的架势。“湘变”当日，李宗仁改装易服逃出南京，3月8日，李通电辞国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李虽表示愿和平解决事变，听候中央处分，还曾答应蒋介石制止武汉方面的军事行动。但进入湖南的桂系军队却置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双方军队各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之决议于不顾，继续进击湘西；且有资料显示桂系之军事行动与部署，“都在李宗仁的掌握之中”。李还拒绝了蔡元培等提出之“各军退回原防，鲁涤平回湘”、“改组鄂、湘两省政府”之和解条件。^③ 不仅如此，李坚称“湘变”乃蒋介石“激人成变”，是为中央找“讨伐”桂系之口实，因信战争绝不可免。^④ 桂系另一巨头白崇禧于“湘变”之初，曾一再呼吁和平，请求胡汉民、李济深、阎锡山等出面调解，表示愿意服从中央：“湘事发生，出人意外，武汉处置，近于操切，不必为讳”，“敢请设法稳定大局，两湖必能听命中央也”。^⑤ 白还向蒋介石做过同样表示。然而随着桂系整体转向激切，白也只能为桂系谋虑万全，做最坏之打算。

对峙另一方之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更为复杂。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湖北此举，破坏中央威信成分不小，倘中央不能制止，则地方割据之形势立成”，“为维持中央威信计，断难照准”。^⑥

① 《吴稚晖致李济深电》（1929年3月），ZHI REEL128/11965。

② 《二李不自由》（无日期），ZHI REEL121/10873。

③ 陈进金：《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117页。

④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546—547页。

⑤ 《致胡汉民等请设法稳定大局电》（1929年3月4日）、《致胡汉民等请转旋政局电》（1929年3月6日），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5），台北，1994年印行，第475、476页。

⑥ 《吴稚晖昨在汤山谈话》，南京《中央日报》，1929年3月25日，第2张第1版；《何成浚二月二十六日省电——湘局严重及赴平辅助》，阎锡山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19页。

胡汉民指责事变乃“军阀行为”，提议查办李宗仁^①；谭延闿等湘系将领亦主张强硬；宋子文因认定政治统一才有财政统一之希望而主张讨伐。然而部分元老如蔡元培、吴稚晖，以及高级将领何应钦等主张缓进，以免兵连祸结，并使冯玉祥等地方军人坐收渔利。鉴于国民党内部态度不一，和战不定，蒋介石首先释放不轻易动武之意。2月24日，蒋偕行政院长谭延闿亲赴上海与李宗仁会商解决事变方案，并表示：“中央对此事但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亦不肯轻于用兵；如不能就范，自当出于一战。”^②蒋为此亦作了军事动员。

2月26日，蒋介石电示刘峙等八位师长，“即日集结兵力，停止剿匪任务”，“于三月三日以前完毕出师准备”。^③3月2日，蒋制定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3日，颁定第一集团军集中计划，要求各军各师于3月中旬集中于皖南、赣北、鄂东北等地。9日，蒋介石针对李宗仁的辞职通电公开致函辩难，对李挖苦激将不遗余力：“徒以一辞卸责，则国人将谓兄畏罪规避，藉端破坏中央，适中外间对兄等蓄意叵测之谣。而兄一生忠直之威名，亦归泡影。事至于此，吾人尚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乎？”^④由上述事实可见，在李济深3月13日入京之前，蒋确实已经做好应对桂方的两手准备，此后是战是和，蒋都将立于不败之地。而此时的吴稚晖更倾向于和平解决“湘变”，并认为李宗仁必服从中央：“李对党国忠实，余可负责担保。湘事本属局部问题，……余更相信李必始终服从中央也。”^⑤私下里，吴坚主李济深入京调解，并担保李济深入人身安全，为此他甚至不惜与李宗仁激烈争吵。^⑥

在时局瞬息万变之际，李济深冒险入京确属犯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大忌。吴稚晖虽然以实际行动主和，但和平究有几分把握，实在难以确知。对李济深入京调解之风险，吴氏也不可能一无所觉。李济深后来对其被囚一事曾有过回忆：“有人说，他们四个人是与蒋介石勾结起来做的，我想不会，蔡元培是个好人，是不会这样的。”^⑦李言到此戛然而止，他并没说吴稚晖等会不会和蒋介石有“勾结”之事，自属可疑。质言之，吴氏遵蒋意愿竭力引李入京调解，而较少顾及其身份之敏感及形势之严峻，无论如何都于友道有亏。他后来曾向家人坦承自己有骗李济深入京被拘的“嫌疑”^⑧，吴氏自谓之骗人嫌疑究该如何理解，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完全明白。

三、吴稚晖汤山陪李系“硬陪”

1929年3月21日，蒋介石以“密通桂系”为名将李济深拘禁于汤山。李入京前所坚信之“我广东有部队，要对我怎样有人在我背后（替我）讲话”^⑨的事情并未如其所愿。其时，虽有粤省军政人员如第八路军参谋长邓世增等对李之被拘表示不安，并电中央有所质问。但胡汉民、古应芬等粤系要人则嘱托粤中将领保境安民，勿预战乱。30日，陈铭枢、陈济棠等发表联名通电，声明粤省军队

① 白崇禧口述，郭廷以校阅：《白崇禧口述自传》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页。

② 《贾景德等致阎锡山歌亥电》（1929年3月5日），转引自陈进金《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第174页。

③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148—150页。

④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166—167页。

⑤ 《吴稚晖为时局辟谣》，《申报》，1929年3月8日，第2张第7版。

⑥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48页。

⑦ 李济深口述：《李济深的略历》，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26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⑧ 《吴稚晖致英详函》（1929年4月20日），ZHI REEL122/11042。

⑨ 白崇禧口述，郭廷以校阅：《白崇禧口述自传》下，第602页。

为党国所有,“不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①,李济深失去了广东的支持。

关于李济深被囚当天吴稚晖之态度,报界有许多绘声绘色的记载。如“殆至中午,吴稚晖、李石曾等,始知李氏被禁。喘息奔于总司令部,求蒋释放,并谓李氏来京,余等曾以生命身家担保,苟有意外,死亦不能赎愆也。”^②另一方面,蒋氏当天日记谓:“昨夜未得安眠,今晨急召任潮不来。乃命人请其来署,对其个人宣布罪状,而仍以参谋长体面待之。稚晖先生知之,来署请保释,如余不允,则其即死于署所。余答其,任潮有罪,不惩则无以行法,余必以先去职而后以任潮交先生。彼亦无辞可对。卒以许任潮与其同住汤山也。”^③此事发生后,作为担保人的蔡元培十分愤怒,立即离京赴沪以示抗议,“实以对不起李氏”^④,吴稚晖反而未有强烈之反应。蒋介石囚李后不久出发征桂,行前致函吴稚晖,函称:

晚生即出发前方,以军务紧急,不及叩别,面呈教诲之罪。晚对于国事之方针,必为先生所洞悉。晚自思绝非贻误党国,轻弃道义之流,此当为先生等所能深信也。唯吾党致力革命,应为国家与民族策长久之治安,即应为国民除统一之障碍。若只顾私人之情感,因循迁就,必致误党误国,万非革命家之所忍为。此乃先生必能谅解晚之困苦与决心。此次出师若仗赖先生等之护持幸而消除叛逆师旅克捷,则国家之福,晚当自动引退以赎前愆,尽其职责,以明素志。万一失败,则晚义无苟全,以身殉党而已。惟是非邪正不可以不辨,曲直本末不可以不明,公私轻重更不可以不问,个人之成败利钝,岂足容怀,而党国之基础,是不能不使之奠定也。目前党国之艰危,千钧一发,甚望先生等有以主持之。^⑤

蒋把“私人之情感”的友道归于误党误国之“小道”,而其从事的乃是扫除国家统一障碍、谋国家长治久安之“大道”,蒋似希望吴氏对伤害友道之事能有所释怀。

李济深被囚,吴稚晖难以自解,于是他以祸福共担为辞陪李同居于汤山。吴在家书中说得明白:“蒋先生把李先生看守起来(不是明监,乃是暗监,说算保护)。我与张先生是有骗他来的嫌疑,故所以不得在此同患难。”^⑥然而同富贵难,同患难亦不易。吴在汤山陪李同居期间,在日记和家书中源源不断地流露出一不满、不愿而又不能不陪的尴尬。4月11日,吴在家书里写道:“只好再候几天,送佛上了西天,也算功德圆满。”^⑦19日,吴连写两函:“近日时世表面虽无如何决裂,暗中仍极复杂,我不得不在此作小梅(按:小梅是李济深女儿李筱梅,也是吴稚晖的儿媳)老子的保护人,故一时不得回来。”^⑧此后,吴氏因儿子生病自己却羁縻于汤山心情随之恶劣:“我并非在此干国家大事,实因陪人受罪,故不能一走就走。”^⑨吴稚晖还抱怨说:“现在我是无可奈何,止〔只〕好在此几天。……中国是绝对无望,我望你们格外要宽心些。”^⑩此后不久吴稚晖终以子病为由下山,之后

①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50—451页。

② 《李济深在京被监视之经过》(无日期),ZHI REEL121/10877。

③ 《蒋介石日记》,1929年3月21日。

④ 《二李不自由》(无日期),ZHI REEL121/10873。

⑤ 《蒋介石致吴稚晖函》(1929年3月31日),ZHI REEL38/1186。

⑥ 《吴稚晖致吴详函》(1929年4月20日),ZHI REEL122/11042。

⑦ 《吴稚晖致吴函》(1929年4月11日),ZHI REEL122/11043。

⑧ 《吴稚晖致吴详函》(1929年4月19日),ZHI REEL122/11041。

⑨ 《吴稚晖致吴函》(1929年4月19日),ZHI REEL122/11054。

⑩ 《吴稚晖致吴详函》(1929年4月20日),ZHI REEL122/11042。

“复以政治奔走,李遂独寓山中”。^①

陪李济深同居汤山后,吴稚晖在家书和日记中不断发泄对李之不满,并常侮称李为“矮”、“矮先生”,不时挖苦之。3月29日,吴在家书中说:“矮先生能一人下围棋,终日不倦”^②,似充满嘲讽。4月16日又谓:“矮先生亦胆小,我们若走了,要担心我们骗他陷着危险,我们又[不]得不在此硬陪。”^③吴稚晖在此明确称陪李同居汤山属“硬陪”性质,并非如其公开所言要与李氏同祸福之正大光明。在陪李同居汤山期间,吴稚晖还多次与蒋介石晤谈,谈及对桂战争等事。当然,蒋和吴不可能不言及李济深,吴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替蒋监视李氏的行动。如吴氏4月份写给蒋的信中称:“任潮在此还守老志,言不与人交通,请放心。”^④

由上述事实可认定,吴稚晖陪李同居自是为挽回颜面而不得不为之的行为,属“硬陪”性质。但在陪居过程中,吴氏频频参与政治,会晤蒋氏,通风报信。此前引李入京被拘的愧疚之心、伤害友道的愤怒之情至此基本消除。谓吴稚晖陪李济深同居不忠,且具卖友之嫌,应不算过分解读。

四、吴稚晖为李济深“恢复自由”奔走补过

李济深被囚的第三天,李石曾、蔡元培联名致函蒋介石:“闻任潮被命严重监视,吴张两先生因有敦劝任潮到京之事,实不得不安危与共,遂亦在监视之中。……弟等亦曾偕吴张两先生苦劝任潮赴京,且保证其无他者,尤希望执事豁达大度,恢复任潮自由,使吴张两先生之自由亦得同时恢复。”^⑤李、蔡之函算得上是直来直去、据理力争。吴稚晖同样为李氏恢复自由做了很多工作,只是吴的力争很有分寸,既尽了友道,亦听了天数。

首先,吴稚晖配合蒋介石,要求李济深公开致信李宗仁、白崇禧,督促两人出洋,以此逼李济深公开认错,并与桂系切割。先是古应芬来汤山,将蒋氏宽宥李之前提告吴:“蒋有电,能宽李,惟要他劝李白出洋。”于是吴稚晖协助李济深写了一封致李、白公开信。^⑥信中,李济深责备李、白在蒋桂战争中之表现:“任部属屡抗中央,不加制止,弟甚惑焉”,并要求他们“严斥旧部,绝对停止蠢抗”,早日放洋,以“有益于社会”。^⑦李为了迎合蒋氏心理不得不将自己置于桂系的对立面。此函虽以李济深名义发表,实乃李、吴两人共同之主张。蔡元培在稍后致李宗仁电中就道出了此点:“望公能采用任潮、稚晖两先生之劝告,即释兵柄,暂避海外。”^⑧吴稚晖替蒋完成了分化粤桂之任务。

其次,吴稚晖多次致函蒋介石,提出恢复李济深自由问题,如其4月30日函谓:

弟意如欲保全元功,必使有力者能弃其部落[曲],共治理于中央。祖安先生早解兵权,敬之先生拒负所部,皆中枢坐镇,于国于身皆何等有赖。不惟兵队足以自保,即身居重要,亦以稳定于中央,并不受人侮诬。昔日精卫先生东奔西走,即受人牵连,今日展堂先生寸步不离中枢,

① 《吴稚晖口中之李济深》(无日期),ZHI REEL121/10820。

② 《吴稚晖致笑函》(1929年3月29日),ZHI REEL122/11048。

③ 《吴稚晖致笑函》(1929年4月16日),ZHI REEL122/11056。

④ 此言转见《吴稚晖致笑函》(1929年4月),ZHI REEL122/11049。

⑤ 《李煜瀛、蔡元培致蒋介石函》(1929年3月23日),ZHI REEL95/7751。

⑥ 《吴稚晖致笑函》(1929年4月16日),ZHI REEL122/11036。

⑦ 《李济深致李白书》,《申报》,1929年4月20日,第3张第10版。

⑧ 《致李宗仁电》(1929年5月10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5页。

虽其旧人颇思活动于粤中之现局,然无隙可乘。此身居中央与身居局部得失之判,可即长明矣。冯焕公静供军政部而不归,何致自趋荆棘?李任潮得汤山之休养,至今不致随黄白等流亡海防。以百川先生之明哲,自能尽释兵柄。然若不能如弟之刍议,毅然来居行政,或监院之职,不惟朝局少此要人,即或道远受人拨弄,终属危道。先生为国为朋友,虽已苦心为之擘画,无如彼此类皆隐有危机。故任潮之免处分,虽属毛细,然人见负疚之重如任潮,中央尚追念微劳而宽释,保其小能而任用,则稍怀忧虑者,益感身居中央之安全矣。任潮之自由,先生已一再提及,弟望下周五国务会议,飭余议及,能早宽限,抑或一道反正。彼之暂居汤山,本可不必轻动也,不过借以讽示知感者耳。^①

此函不仅反映了吴稚晖的政治见识和对蒋氏心理的敏锐把握,亦显露了其蒋非同寻常之关系,甚或有“国师”的眼光和气度。当然吴函百般曲折、费尽心机亦是为了李氏自由。

最后,吴稚晖和蒋介石商量处置李济深之方法,即逐步宽恕,不准离京。4月份,蒋介石对打败桂军已有把握,分化打击粤桂之目的已达,他没有必要继续扣留李济深以贻人口实,于是示意张静江可有条件开释李济深。得此消息,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迅即商量对策。吴准备动员胡汉民、古应芬、戴季陶、张静江与自己五人联名提出中央政治会议,说明释李之理由与安置办法。在提出正式会议之前,吴稚晖将其想法和会议说辞告知蒋氏:

李任潮以附逆嫌疑,开除党籍,并由国民政府革职处分。两月以来,□□等细加调查,彼与白崇禧、李宗仁等,虽属同乡,然非素交。惟任广东政治分会主席时,难免以乡谊对白李等有所宽纵,且任粤政,迹近矜夸,诸多未合,加以惩戒,自亦适当。但白李等逆谋,确未参预,且从前在粤从政,稍有微劳,足保现在屏居郊畿。当能刻意自治,理能安详谨慎。其才本尚精细有用,故本会议酌予讨论,可否暂时准复其自由,并知照国民政府,除革职外,免其处分。徐加以考察,再候相当保用。至其党籍,应当恢复与否,俟有奋勉实绩再报告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敬先请复李济深自由,并免处分,缓由提候公决。^②

此函为了给李济深开脱,亦为了使蒋介石能够接受而不惜前矛后盾,以致难圆其说。私底下吴继续对蒋表示,“虽公事上准复自由,暂时任潮仍应留居汤山,俟相当时,先生命如何即如何”。^③这就给了蒋对李之最终处置权。在吴稚晖等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7月31日决议恢复李济深自由。但以“中央尚拟有所借重”为词,“暂时不至离京”。^④李氏尚未恢复完全自由,但至少下了汤山。吴稚晖也算是“善始善终”:陪李上山,又陪李下山,也是其对当初误人入险,最终使人彻底丢掉兵权和地位的一个朋友式的弥补。

五、结语

在李济深被囚汤山之事件中,吴稚晖地位关键而角色尴尬。就个人情感而言,作为李济深安全

① 《吴稚晖致蒋介石函》(1929年4月30日),ZHI REEL38/1197。

② 《吴稚晖致蒋介石函》(1929年5月),ZHI REEL128/11969。

③ 《吴稚晖致蒋介石函》(1929年5月),ZHI REEL128/11969。

④ 《李济深尚在汤山》,《申报》,1929年8月2日,第2张第8版。

担保人的他不能不顾及个人形象和社会舆论;就蒋介石之政治伦理而言,国家实质统一、中央集权管理才是最高追求,为此不惜牺牲个人之信誉尊严。在这一矛盾纷争中,吴稚晖不得不做出牺牲。然而蒋介石强制吴氏同其立场保持一致,坚守国家统一大道而不择手段之行为,虽有助其短期成功,长远来说却导致中央和地方互信之基础越来越薄弱。如冯玉祥所言:“蒋之扣李任潮,犹如袁世凯之扣蔡松坡也”,“李任潮因调停大局,为蒋监禁,此后孰敢入京”。^① 双方既无信任,则往往为达到彼此之目的而开兵燹,以至于兵连祸结,这又有违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化、现代化之进程。

吴稚晖虽自民国以来就以超然于政治之上的姿态示人,既是“全国学人的表率”^②,又有革命元老之尊崇,同时游离于国民党内部的帮派之外,“清望”素著。然而,其尊崇超脱之地位,与他曲承蒋介石,与蒋之中央始终保持一致直接相关。如台湾学者所言,吴稚晖“谋,蒋公所欲谋者,决,蒋公所欲决者。……心其心于蒋公,言其言于蒋公;为蒋公心心以之,故能分蒋公之忧,为蒋公言言以之,故能纾蒋公以瘁”。^③ 以至于冯玉祥曾公开辱骂吴稚晖乃“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④ 吴氏侍蒋之殷勤与不贰的形象在时人心目中似早已定讞。

在汤山案中,吴稚晖先是误入人险,继是陪人受罪,后则助人自由,不能说未尽友朋之道,但其间并未表现出生死以之之心,反具为己清名之谋,且有助蒋卖友之嫌。吴在李蒋纠纷中曾经挣扎徘徊,也在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中与时俱进。当传统之友道演变成必须屈从于替蒋统一国家张目之时,一贯承迎蒋氏的吴稚晖不得不以蒋之是非为是非。政治事件的起伏祸福之间,突显了政治的“恶徒”^⑤本性。吴稚晖在此过程中无疑只是政客而已,显非一个“永远与自然同在”的“风尘逸士”。^⑥

[作者沈成飞,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胡永恒)

更正

因作者和编者疏漏,2014年第5期第7页“雍正十三年(1748)”,公元纪年标注有误,应为“雍正十三年(1735)”。2014年第6期“目录”与“2014年总目”中的“《张荫桓日记》”,应为“《张荫桓日记》”;第64页“史密斯(Ian Douglas Smith)”,应为“史密斯(Howard Alexander Smith)”。特此更正,并向读者深表歉意!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0—611页。

② 蒋中正:《对吴敬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词》(1964年3月25日),转引自汤承业《吴敬恒述传》第6卷,台北,世界书局1987年版,第3383页。

③ 汤承业:《吴敬恒述传》第6卷,第2989页。

④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

⑤ 此言乃吴稚晖家书中的原话,可见《吴稚晖致笑详函》(1929年4月20日),ZHI REEL122/11042。

⑥ 台湾学者为吴稚晖作传,题名“永远与自然同在”(蒋经国言),大陆出版《吴稚晖别传》,则以“风尘逸士”为名。